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第4辑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专辑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No.4)

林聚任 何中华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第4辑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专辑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No.4)

林聚任 何中华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第4辑,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专辑 / 林聚任, 何中华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209-04799-9

I. 当… II. ①林… ②何… III. ①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②农村—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D668 - 53 C912. 8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937 号

责任编辑: 马洁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

林聚任 何中华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 (165mm × 23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799-9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0539)2925659

前 言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也有了近 30 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农村 / 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了总结中国学术界近 30 年来关于乡村社会研究的成就,探讨乡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好地开展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研究,推动社会学本土研究的发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于 2008 年 9 月 19~20 日在济南召开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行政学院、南通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工商学院、日本岐阜大学以及主办方山东大学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研究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本辑所刊出的就是这次会议优选的主要论文。

新时期中国的农村 / 乡村社会研究已有了近 30 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应该进行系统的回顾、反思,这 30 年来农村社会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理论、哪些方法值得我们去总结?关于这种反思,首先应该是理论和方法层面的。一个学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就应该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方法。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它在理论与方法上有哪些成果,是否有了自己的学派,是否有自己的学科体系等等。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其标志一方面就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所以值得我们从这一方面去作些回顾、反思。

另一方面,是对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反思。我们都关注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这些既有浅层的问题,也有深层的问题;既有近期的问题,也有长远的问题。这次研讨会中更多学者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关注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问题,也一直在思考农村的出路和最终归宿问题。通过我们所作的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农村社会的衰微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例如,当前出现的村落/村庄的合并、村庄“空心化”等。从这些方面看,村落衰微的趋势非常明显。未来的农村将不再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地方,但是从生活居住形式来看,未来的乡村可能是人们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整个社会高度发展之后,人们将会更喜欢居住在乡村,而不是都市,即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将会发生分离。因此,我们同样也要去关注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那些最根本的发展趋势的问题。我们通过这次研讨会也达到了这方面的目的。

这次研讨会共分为《大会主题演讲》、《乡村发展与治理》、《城乡关系》、《农村社区》四项议题。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从多角度对中国乡村以及乡村研究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庄孔韶介绍了一些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讨论了乡村社会过程的生计变动方式与社会文化系统变动所牵涉的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问题。赵旭东作了《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的演讲,他认为中国以往的乡村研究缺乏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指出中国乡村研究者应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上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贺雪峰对赵旭东的发言作出了回应,认为赵教授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值得学者深思的,但他不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应该恢复中国社会学的三大传统(分别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的传统),以“改造中国”为目标来认识中国、开展研究,同时强调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统一。刘翠霞以《走近村落,超越村落——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为题,讨论了中国乡村研究中的“二元论”困境及真实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并提出了用场域建构主义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观点。全志辉在《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确立和研究框架》中,说明了乡村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论

域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以农民政治行为为分析中心的研究框架,讨论了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主要的研究问题。卢晖临以“盖房竞赛”为例生动地阐述了后集体时代中国乡村的地位竞争,并分析了在这种竞争中农民的复杂心态。来自日本的学者山崎仁朗介绍了日本乡村研究的实例,为中国的乡村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方面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乡村研究的主体性、学科性、问题性以及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大家讨论得十分热烈,对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方法及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最后由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林聚任教授和《开放时代》主编吴重庆教授分别总结了本次研讨会的缘起和组织过程,认为会议在总结和回顾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预期目标,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本辑所收录的这些论文,是各位作者在会议论文基础上又作了某些修改加工而成的,感谢各位论文作者的积极合作与支持。本辑顺利完成出版得到了山东大学和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李晓玲、胡兰芳等研究生同学也在论文编辑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编委会

2008年12月

目 录

001 前 言

研究回顾与反思

001 赵旭东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032 庄孔韶 乡村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观察

037 林聚任 吴 娱 曲媛媛 近 30 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回顾

——对《社会学研究》231 篇农村研究论文
的内容分析

055 刘翠霞 林聚任 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078 贺雪峰 董磊明 陈柏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102 全志辉 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确立和研究框架

乡村发展与治理

113 邹农俭 后农税时代农村发展的若干问题

125 马广海 宋 禧 农村税费改革的社会影响

——从基层国家建设角度的分析

136 文 军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

——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研究

151 宋全成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及对策

——非自愿移民与社会学研究的双重视角

- 164 崔树义 社区、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建设：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几个概念问题
- 179 林鲜明 城乡老人家庭与孤独感研究
——以烟台老人调查为例
- 195 泥安儒 [丹麦]曹诗弟 中国农村养老中的个人性因素分析
- 212 虞海鹏 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

海外资讯

- 227 [日]山崎仁朗 山区能否重生？
——来自日本郡上市和良镇的报告和建议
- 244 稿 约

CONTENTS

Foreward	001
----------------	-----

Study Review and Reflection

“Questioning China” into “Understanding China” ——Rural China Research as the Other of the West and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Zhao Xu-dong	001
Anthropological Observation in the Studies of Rural SocietyZhuang Kong-shao	032
A Review of Rural Social Researches in the Thirty Years in China ——The Content Analysis on 231 Articles about Rural Researches from Sociological Studies Lin Ju-ren, Wu Yu, Qu Yuan-yuan	037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Villages Liu Cui-xia, Lin Ju-ren	055
The State and Prospect of Village Government Researches He Xue-feng, Dong Lei-ming, Chen Bo-feng	078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hina Politics Study and its Framework Tong Zhi-hui	102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Several Problems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imes of the Post-Agricultural-Taxes Zou Nong-jian	113
Social Implication of the Tax Reform in Rural China——A Perspective of State-Building at Grassroots Level..... Ma Guang-hai, Song Tang	125

The End of Farmer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ole of New Townspeople in Suburb of Shanghai	Wen Jun	136
On the Problem and Solution of China's Landless Farmers in the Urbanizati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Sociology	Song Quan-cheng	151
Community,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Community Building: Some Conceptual Issues in Recent Rural Community Building	Cui Shu-yi	164
Study about the Loneliness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The Survey of Older Persons in Yantai as an Example	Lin Ming-xian	179
Individuality among China's Rural Elderly	Ni An-ru ,Stig Thoegersen	195
The Rural Society: "Order" and "Culture"	Hu Hai-li	212
Information Overeas		
Is It Possible of the Revival of Mountainous Regions? ——A Report and Advice from Wara Japan.....	YAMAZAKI Kimiaki	227
Notice to Contributors		244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赵旭东

【内容提要】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乡村研究的主题，并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却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应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上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Questioning China” into “Understanding China” ——Rural China Research as the Other of the West and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Zhao Xu-dong

Abstract: As a paradigm to see the rural China as “questioning China” is a motive power to do their researches. Atomazation, lineage and village politics are key issues to which those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and urgent to resolve through fieldwork. Although based on thei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fieldwork and ethnography which led them to present more data and fieldwork materials accumulated, they can't promote their understandning level about the rural China. Rural China researchers should relocate their position as an understander and re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research from the thickness of ethnography in full perspectives and culture unstanding.

一、引言

中国近30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的前提是把乡村笼统地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这样的做法无疑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路径。^①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问题即刻转变成了如何去接近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大规模村民自治的展开迎合了城市对于公民权利追求的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诉求,而与之相应的是,村落政治研究寻求的是如何在本土资源的层次上为这种舶来的与想象中的民主政治在乡村这块土地上找到可持续生长的发展空间,乡村生活方式的描述成为“中国特殊论”的一种借口,过多的事件过程的分析强化了乡村成为一个有问题空间的社会记忆的强度。

跟毛泽东早年的调查所不同甚至相反的是,在面对乡村无法彻底实现西方观念下的民主与自治的实践困境之下,另一派的研究者重新开始抓住宗族这根救命稻草,试图以此来做成一剂三明治式的良药来强化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而不管在今天宗族对于当地人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有这些对乡村的改造和问题意识,在我看来都是观察者带着强有力外来者的观念和想象在把他们所关怀的乡村界定成为一个成为问题的地方。但是,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显然,这些并非专业的也不以理解和宽容为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他们也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碰撞”上,而是目光向下只看到了在他们看来成问题的乡村问题。在此意义上,跟早期中国乡村研究的路径类似,中国乡村在这些研究者的眼界之中成为一种“西方的他者”,这不再是“自己看自己”的一种生活实践,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把近距离的自己看成他者的一种颠倒的认识论。

^①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二、原子化与村落共同体

尽管许多有志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更乐于将自己标榜成为一名脚踏实地展开田野调查而对于西方的理论不管不顾、直面当下乡村现实的乡土研究者,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很快就转变成为如何借助调查来呈现当下乡村困苦的状况进而实现其改造乡村的目的。^①“原子化”也许是这样一批研究者发明出来的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状况的基本判断,贺雪峰在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时,借用马克思对于农民整体的“一袋马铃薯”的比喻,来类比中国当下乡村农民的关系状况,认为当下的乡村,特别是靠近中部的荆门的乡村已经呈现一种“村庄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②的原子化状况。

在上述这种外来的观察者对于乡村社会发展中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人们相互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所表现出的极端忧郁当中,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学理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乡村社会原本就一定是非原子化的。这也许是近年来的乡村建设以及乡土社会研究学者所没有意识到的,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带有实质意义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后续研究都可能是虚妄的。

非原子化的村落共同体的概念或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一再指出的跟泥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都显然是跟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提出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或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二元区分密不可分,这在更大的范畴上便是城市与乡村的比照和在生活形态上的对立。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则是,中国

^① 在贺雪峰为其最新的文集《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所撰写的《自序》中,特别提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乡村研究的起因和目的,开篇的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印证了这些人急于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的企图心,如其所言:“1990 年代中期国内政治学界开始‘重心下沉’,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下沉到对基层政治的研究。1988 年颁布试行《村委会组织法》,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开始发生变化,政治学界较早关注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化,并在 1990 年代大规模进入田野,试图编制‘政治软件’,以在农村实现民主。”引自: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②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0 页。

乡村与城市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对立？也可以反过来说，以城市的眼光来审视乡村，或者忧虑乡村变得越来越像城市，这背后不是在坚持一种预先接受下来的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这样的二元区分吗？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费孝通教授早年依据其在云南的田野调查而对于中国乡村的基层组织形态的恰当描述，我们也一样没有必要去否定延续《乡土中国》一书的思考套路的研究者对乡村社会各类离开乡土中国越来越遥远的社会变迁的描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已经接受了一种西方持久存在，并有着支配作用的二元论的思考方式，并且，一旦这样的基于西方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划分模式在西方以外的社会遭遇到了反例，那么所有的建立在这样的分类基础之上的描述的可信度都必将受到置疑。

对此一西方的分类概念最先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当属马克思。他在对印度的民族志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之后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试图要打破既有的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的做法的一种颠覆性的怀疑。他从人类学家丰富的民族志当中看到了在西方以外的印度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独自成为一体的封建时期的公社制度，而是“个体的公社把国家当作他们共同耕种的土地的真正主人”，国家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剥削性实体，但是东方的老百姓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慈善机构，施舍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结果国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要么是统治者，要么就是如上帝的化身一般来对其加以膜拜，进而导致了不可一世的专制君主的产生，这特别体现在以灌溉为核心的专制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上。^①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下农村原子化的概括显然是缺乏宏观比较的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而基于此概念基础之上的所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的提出更是不能够看到基层社会从来就不是封闭和自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一个村落共同体可能并非像一般人所构想的那样是一个把所有人都圈定在一起的一个孤立的村庄，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再葬于斯，但是在这些生与死的节点之间却是有不断的离开与返回，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那些令人悲伤的离别之词以及令人欢喜的聚会之词会如此地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产生一

^① 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覃光广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

种共鸣。^①离别和再次聚会成为村落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原子化也许是发生在离别之时,却可能被年节之时的回归故里所否定。原子化的趋势与共同体的周期性回复构成了乡村生活的全貌,孤立地看待这个全貌,自然是一种印度人所嘲笑的那种盲人摸象一般地不着边际了。

三、宗族政治与乡村民主政治

与乡村原子化的讨论所不同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有一大批的研究者特别关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的宗族政治对这种未来可能的乡村政治民主化的消解作用。这些学者中有一部分寄希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可以先从乡村开始,恰如贺雪峰所总结的那样,他们带着强烈的本土政治关怀,希望“尽快地自上而下改变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②。在各种海外基金会的资助下,乡村成为一个新的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试验场。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影响之下,村治的概念成为跟传统宗族概念几乎是相对立的一个新的概念而应用于对乡村政治及其组织发育的解释之中。“村治”成为村级治理的一个代名词来指涉“在村民委员会社区内及与村级社区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和调控”^③。而在村治概念的最初提出者看来,村治更多的是跟乡镇以下的乡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特别关注“村民自治的治理结构”,强调“村委会的管理行为属于群众性自治行为”。^④

显而易见,后来的研究者在修订先前的村治概念时已经不再有意强调村民自治的问题,而是径直把村治这一原本是借助乡村自治来体现西方民主精神的最初的国家意志转变成为一个乡村政治学的概念,那就是对于“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和调控”。在这样一种修辞性的变换之中,“村民自治”彻底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取而代之地把西方民主概念中核心要素的“公共”引入

^① 对这一点,英国人类学家石瑞(Charles Stafford)有精彩的分析和民族志描述:Charles Stafford, 2000, *Separation and Reun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③ 肖唐镖:《导论》,载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④ 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转引自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注释 2。

村治研究之中。郭正林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村民自治”难以反映村庄治理的复杂结构，而提倡用“村政”的概念来替代村治。^①

在这样的一种概念转换当中，我们看到了对西方民主概念接纳的崭新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村落政治学者径直地把村落的生活空间转化成为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共事务成为与西方市民社会对等而无差异的建构主体来加以建构，并通过比照在乡村社会中持续发生着影响力宗族的活动来进一步强化在宗族制度之外来建构村落新的公共空间及村治的可能性。在对村落宗族的细致调查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所得出来的结论竟然不是乡村宗族本身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而是面对他们构想中的宗族本应该能够做些什么，而现在却无法发挥效能的一种凄凉之感，而在另外一方面却又进一步把宗族界定为一种必须要加以超越的自身无法发生改变的一种村治发展的障碍，新的村治资源因此需要再去寻找。

在对一个赣南村落宗族强弱分疏背景下的村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肖唐镖得出了八点结论，其中最后一点最能体现作者的价值判断，尽管文字略显冗长，但还是有必要加以全文引述：

对宗族在村治中作用的两方面评估。一是效能评估。宗族虽已广泛影响到村治的各个方面，并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但总体而论，其管理水平和效能却很低，对于族内、庄内的人际关系和秩序也难以实现有效整合，已表现出较严重的无能为力之感。二是价值评估。就华村宗族已发生的作用看，其正面效应主要表现在：及时填补了村治中的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同时强族组织及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抗拒不法侵害、保障族民利益的工具。但是，这种正面效应却是以更大的负面效应为代价的，如在日常生活中宗族倡导的仍然是“男尊女卑”、崇尚风水和迷信之类传统规则和观念；在村落和村社区管理中涉及族际村际关系时，宗族总是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依归，并奉行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逻辑，与现代的平等和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迄今为止，宗族的这种行为逻辑与规则尚未出现变迁的动向。因此，笔者以

^① 郭正林：《中国村政制度》，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转述自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导论》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注释 2。

为：要实现村治秩序的有效整合，既无必要也不应当再向宗族寻求帮助，而应当努力寻求新的资源、新的组织和新的机制，尽管宗族的存在及其功能不可能被人为地取消。^①

这样的结论不仅让我们感觉到研究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宗族作用理解上的偏差，更让我们感觉到了研究者由外而内地看待宗族的现代功用时的国家视角以及急于印证自己心目中既有结论的意识。我们的研究肯定不是用来对宗族在现在所具有的正面和负面的维持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功能给出的一种主观判断，更不是对宗族的性质以及存在的问题比照着西方的平等与法制的精神来给出一种描画，而最为重要的是要在一种学术思考的线路中把宗族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中来加以理解。

宗族意识在 1979 年以前的讨论并非是学者关注的主流，人们受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的影响更加乐于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宗族似乎已经在 1949 年以后随着毛泽东之前所说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而销声匿迹了。但是，在 1979 年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逐步在全国落实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化力量的衰弱，宗族或家族意识逐渐得到恢复，人们开始组织起来重新修建祠堂，特别是在华南、东南以及赣南地区，情况就更加突出。学者的研究视角，特别是一些历史学者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关注起宗族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起来。^②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像一些后来的调查者认为的这是没有先例的，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历史学家的研究更有人类学家的研究，早期有胡先晋和林耀华的研究，之后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华南宗族的整体性研究，所有这些都不否认宗族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保护和基层社会秩序维持的功能。

也许我们可以把所有那些不去研究宗族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史而去直接研究乡村宗族现状的学者统称为中国乡村宗族问题的界定者，这些界定

^① 肖唐镖：《宗族强弱分殊背景下的村治》，载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 页。引文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②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载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9~123 页。